


現代佛學

1

1954

迎接一九五四年	趙樸初(一)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二)
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條例	(二)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	
關於發行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指示	(二)
迎接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	人民日報社論(四)
愛護公共財物	賓衢(六)
佛家辯證法	呂澂(一〇)
保護古代文物的意義	(一二)
印度梵文對中國聲韻學的影響	李子曰(一三)
釋迦牟尼的時代及其成道	慧風(一六)
釋迦牟尼的本生故事	鑒安(二一)
大衆	潘陽市佛教界學習情況 導塵(二三)
園地	必須糾正農村佛教徒輕視農業生產的傾向 戒圓(二四)
佛教動態	(二六)

 <p>現代佛學</p>	<p>編輯者：現代佛學社 出版者：現代佛學社 社址：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十一號 電話：二局一六〇八號</p>	預定價目	
		<p>全年十二期 三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一萬七千元 三個月三期 九千元 零售每冊 三千元 平郵在內 掛號另加</p>	<p>總數：第11期 印數：4,000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p>

偉大的一九五三年過去了。一九五三年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是充滿了勝利的一年：抗美援朝的勝利和朝鮮停戰的實現，國家規模計劃建設的開始，全國基層普選的進行，都是震燦全世界的大事。一九五三年在新中國歷史上又寫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的一頁。

我們以更大的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一九五四年的來臨。沒有人懷疑，一九五四年將帶給我們以更大的勝利。

一九五四年是我國在過渡時期為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而實行的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第二年。這一年度計劃的完成，關係着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我們之所以歡欣鼓舞，就是因為我們堅決相信：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在全國人民一致努力之下，一九五四年度的建設計劃一定能夠勝利完成；而我們佛教徒一定要和全國人民在一起，為完成一九五四年度計劃而共同奮鬥。

「莊嚴國土」，是佛教徒的崇高理想；而現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所指示的，就是莊嚴國土的事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將使我們的國家沒有剝削階級，沒有窮人，大家勞動，發展生產，經濟不斷地高漲，人民物質生活不斷地改善，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斷地提高，祖國山河一天一天地增加它的美麗——這已經不是理想，而是逐步在實現中的事實了。對我們佛教徒來說，這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的機緣，能夠用父母所生之手來建設「人間樂園」。我們佛教徒應當怎樣地勇猛精進，怎樣地竭智盡忠來參加這一偉大莊嚴的事業啊！

因此，我們佛教徒們新年第一件應

迎接一九五四年

趙樸初

們多餘的和可能節約的資金，通過購買公債來支援國家建設，加速國家建設。這次公債的發行，對國家來說，把分散在人民手中的零星的，閒擱着的資金集中起來，用之於國家重大的建設，從而一步一步地增進人民的福利，這是一件十分正確而重要的措施；對個人來說，把自己的可能節省的一滴，投入人民事業的大海之中，不但使這一滴永遠不會乾涸，而且可以生起大海的作用，運載人民的舟船到達社會主義的彼岸，對廣大人民作廣大饒益，其為功德，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何況購買公債，對個人來說，還有它的儲蓄的意義呢？

爲了祖國建設，爲了人民利益，我們應當爲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推銷任務而努力，

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國家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總路線是照耀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它同樣地照耀着我們佛教的各項工作。我們應當動員各地教友們積極學習總路線，要求懂得總路線的基本內容和精神實質，並把總路線的精神貫徹到我們的思想行動中去，貫徹到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去。這樣做，不僅是爲了我們可以不犯或少犯錯誤，而更是爲了我們可以更好地爲人民服務，更好地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就是「莊嚴國土、饒益有情」的偉大事業。

認購公債，是爲了貫徹總路線，學習總路線，能使我們更懂得認購公債的意義。踴躍認購公債，認真學習總路線，全國佛教徒都應當以此兩件有重大意義的事來迎接勝利的一九五四年。

當做的，就是踴躍認購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應當號召我們的教友們將我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條例，業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特令公佈。

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

一九五四年

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條例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加速國家經濟建設，逐步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特發行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發行

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指示

關於發行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條例，已經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本院第一百九十六次政務會議通過，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公佈。公債發行總額為人民幣六萬億元，定於一九五四年一月開始推銷和認購。除分配給各地區的推銷數字另行電告外，茲將推銷公債有關諸問題，作如下的指示：

第二條 本公債的募集及還本付息，一律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

第三條 本公債發行總額定為人民幣六萬億元，於一九五四年一月開始發行，十月一日起計息。

第四條 本公債面額分為壹萬元、貳萬元、伍萬元、拾萬元及伍拾萬元五種。

第五條 本公債利率定為年息四厘，自一九五五年起，每年九月三十日付息一次。

第六條 本公債本金分八年作八次償還，自一九五五年起，每年九月三十日抽籤還本一次，第一、二次各抽還總額百分之五，第三、四次各抽還總額百分之十，第五、六次各抽還總額百分之十五，第七、八次各抽還總額百分之二十。

第七條 本公債的發行及還本付息事宜，指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及其所屬機構辦理之。

第八條 本公債不得當作貨幣流通，不得向國家銀行及公私合營銀行抵押。

第九條 如有偽造本公債或損害本公債的信用行為者依法懲處之。

第十條 本條例自公佈之日施行。

一、一九五四年是我國在過渡時期為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而實行的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第二年，完成這一年度的計劃，是關係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一件大事，全國人民必將十分關懷和積極努力。但經濟建設所需資金，數目較巨，必須從各方面籌集，始能有所保證。除國營企

業收入和各項稅收以外，動員全國人民，以其一部分多餘的和可節約的資金，認購公債，支援國家的建設，不僅在經濟上是籌集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需資金的重要的和經常的方法之一，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四年以來，我國經濟已勝利地完成了恢復階段的任務，開始走上建設時期，工農業生產均有發展，人民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特別是經過抗美援朝與各種社會改革運動，人民的政治覺悟大為提高，因此，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推銷和認購，是一定能夠勝利完成的。

二、一九五四年公債，是爲了加速國家經濟建設而發行的，定名爲「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公債的利息，定爲年息四厘。此項利息，每年支付一次，並從第二年起即開始抽籤還本，八年還清。人民認購公債，一方面是支援了國家經濟建設，一方面又可按期收回利息和本金，並且益增長地分享國家建設的果實，實屬公私兩利，一舉兩得。

三、公債發行數額的分配，根據各階層人民的經濟生活、農村耕地面積及作物種類、城市工商業情況等條件，預定城市推銷四萬二千億元，其中工人、店員、政府機關團體幹部以及文化教育工作者，分配一萬億元，私營工商業（包括股東及資方代理人）、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及其他城市居民分配三萬二千億元；預定在農村推銷一萬八千億元。

上述數字是不算大的。全國工人、店員、公教人員及部隊的幹部，幾年來工資已有提高，且無所得稅負擔；全國農民，經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以及國家貸款的幫助，生產業已恢復，並有了發展；私營和公私合營工商業，由於國營經濟的正確領導和國家加工訂貨的幫助，生產增加，業務亦有發展。因此，城鄉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一定的改善。在這種情況下，拿出一部分收入和積蓄，購買公債，以支援國家經濟建設，無疑地是做得到的。國外華僑，對祖國建設一向熱心，自動地踴躍認購是可以預期的。總之，只要全國人民一致努力，完成此項數字是完全能夠做到的，而且是可能超額完成的。

四、發行時間：在一九五三年底以前，應做好準備工作，自

一九五四年一月起，開始推銷、認購和收款，到十一月底結束。並自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起，計付公債利息。其提前繳款者，採用貼息辦法，以資鼓勵。

五、推銷方法：（一）在城市，採取由人民自願，一次認購的方法，並限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底以前，認購完成。至於認購後繳款，可視各種不同的情況，分別處理：對於機關、企業、團體、學校的職工和部隊幹部，可由所在單位，在其工資或津貼內分期代繳，亦可一次繳納；對於私營和公私合營工商業（包括私資股東及資方代理人）可採一次繳清或分期繳納方式，但應注意將公債收款時間，與所得稅繳納時間錯開，以減少繳款之困難；對於城市居民個人購買公債款項，可以一次繳清，亦可以分期繳納。（二）在農民中推銷公債，可採取定額分配與自願認購相結合的方法，按農民的經濟情況，分配合理的數字，然後由農民自願認購，農民可能而又自願時，可以多購，但不必認購過多，以免影響生活，一般以不超過原分配數二分之一爲限。認購期限亦以一九五四年三月底爲止。認購後，款項可分二至三次繳納，亦可一次繳納。收款時間應適當照顧農民收入的季節性，其與農業稅徵收工作如何配合，由當地政府考慮決定。

對於無力購買之工人、農民、公教人員及其他各界人民，不得強令購買。

六、爲了推銷工作的勝利完成，各級人民政府應在發行以前和發行過程中，重視宣傳教育工作。各地應利用各種機會、各種場合，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工商業聯合會、同業組織、各種座談會等，結合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總任務的教育，結合人民政府三年來對「一九五零年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還本付息所樹立的信用，向各界人民反覆說明發行公債的政治和經濟意義，及其對國家和人民的好處。同時各地應組織公債推銷委員會，由當地人民政府指定專人負責，吸收財政、銀行、工商、農業等部門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各界公正人士參加，辦理宣傳、推銷和催收債款等事宜。此外，各級文教機關、人民團體亦應利用各種機會及各種方式，負責進行宣傳和勸募工作。

七、各地區應吸收一九五零年推銷公債的經驗，改正缺點，發揚優點，將一九五四年公債的推銷工作提高一步，做到公平合理。在工作進行中，要認真貫徹民主協商的精神，堅決反對採取強迫命令的辦法。在推銷和收款期間，要注意組織財政、金融、貿易和合作機關，根據金融物價情況，採取有效的措施，保證市場上籌碼適度，物價正常。我們國家的經濟，正在向前發展，對

迎接一九五四年

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

人民日報社論

總理 周恩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

在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擴大的第五十一次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一九六次政務會議討論了關於發行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問題之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批准和公佈了「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條例」，並由政務院同時發出「關於發行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指示」。這是中央人民政府為加速我國經濟建設而採取的一個重要措施。

這次發行的公債，叫做一九五四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它的意義非常清楚，就如政務院的指示所說的：「一九五四年是我國在過渡時期為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而實行的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第二年，完成這一年度的計劃，是關係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一件大事，全國人民必將十分關懷和積極努力。但經濟建設所需資金，數目較巨，必須從各方面籌集，始能有所保證。除國營企業收入和各項稅收以外，動員全國人民，以其一部分多餘的和可能節約的資金，認購公債，支援國家的建設，不僅在經濟上是籌集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需資金的重要的經常的方法之一，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

於發行公債。我們亦有了一定的經驗，而且此次公債收款時間又較長，只要各級領導注意掌握，這次公債的發行，是應該而且能夠作好的。

現在，全國人民都滿懷着對於社會主義幸福生活的希望和信心，為實現這一偉大的目標而奮鬥，並首先為實現國家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而奮鬥。全國人民懂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現，將進一步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生活的上昇，將為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打下穩固的基礎。但是，要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要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必須有大量的建設資金。這樣數額鉅大的資金的來源，主要的當然是依靠國營企業的收入和各項稅收。以一九五三年為例，這兩種收入約佔國家財政常年純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它們構成了供應國家建設資金的主要部分。但是，除此以外，國家還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從其他各方面籌集資金，才能充分保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因此，國家發行公債，動員人民以其積蓄和可能節約的資金，參加國家的建設，就成為籌集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需資金的重要的和經常的方法之一。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曾多次發行公債，他們把發行公債看作經濟和文化建設的重要的財政補助源泉，他們把發行公債當作國家的一項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工作。這是因為公債的發行，對於國家和人民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它可以把分散在人民手中的零星的資金，集中起來用於國家重大的建設

事業，從而一步一步地增進人民的福利；它可以把人民手中一部分閒置的金錢，變為有用的資金；同時，它還具有儲蓄的性質，成為國家組織人民儲蓄的有效方法，人民購買公債之後，可以按期地收回利息和本金。這次我們的國家建設公債總額為六萬億元，國家還本付息總數將為七萬三千二百億元，認購人除到期收回本金外，還可以分享國家建設的果實，得到若干利息收入。這就說明基於國家建設的需要和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發行的公債，是只有好處而決無壞處的。

這次公債的發行，又是在我國國民經濟日益上昇和人民政治覺悟普遍提高的基礎之上的。四年以來，我國已經完成了恢復經濟的任務，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工農業生產都有了發展。一九五二年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絕大部分已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年產量，一九五三年預計，又將有許多工農業產品的生產額完成計劃。隨着生產的發展，人民的生活已普遍有所改善，人民的購買力，已普遍有所提高。四年以來，經過各種民主社會改革運動，經過抗美援朝鬥爭的勝利，人民的政治覺悟已大大提高，愛國主義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因此，人民對於國家各項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措施，莫不擁護和支持。而且，這次公債發行的總額祇有六萬億元，為數不大。根據政務院的指示，這六萬億元，預定在工人、店員、政府機關團體幹部以及文化教育工作人員中推銷一萬億元；在農村中，推銷一萬八千億元；向城市的私營工商業（包括股東及資方代理人）、公私合營的私方及其他城市居民，推銷三萬二千億元。這樣分配是合理的。我們知道，廣大職工羣衆，在國家的各種政治和經濟鬥爭中，從來都是站在鬥爭的前列，且無所得稅負擔；農民人數最多，分配數量不大，特別是最近受到了一次廣泛而深入的總路綫的教育，他們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抱有熱烈的期望；全國私營和公私合營工商業的生產和經營，幾年來都有了相當的增長和發展，工商業者和其他城市居民把多餘的一部分資金和積蓄，借給國家，投入生產，不但可以避免資金的閒置，而且是支持國家經濟建設的愛國主義的表現。同時，這次推銷公債，又採取了較為便利的辦法，即在一次認

購之後，可以一次繳款；也可以分期繳款，並可延長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底以前繳款完畢。因此，這次公債的數額，對於各階層人民，都是力能勝任的；公債的認購，是一定能夠順利完成並且可能超額完成的。

把這次發行建設公債和一九五〇年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時的情形作比較，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新的有利條件。在一九五〇年，那時開國不久還處在財政經濟的困難時期，人民生活也處在困難當中，但是國家發行公債的決定一經公佈，人民就立即響應號召，踴躍認購，順利完成了推銷和認購工作；而今天，則早已不是一九五〇年那樣的困難情況。那時物價還未完全穩定，公債的計算，還不能不採用折實單位的辦法，而今天，物價早已完全穩定，並且隨着國民經濟的更加發展，金融物價必將確定地穩定下去，採用人民幣為計算單位，已可以充分保障認購人的利益。總之，現時的各方面條件都比一九五〇年為有利。因此，可以肯定，在這次公債開始發行後，廣大人民必將再一次表現出熱愛祖國的偉大精神，響應國家的號召，掀起一個踴躍認購公債的熱潮。但是，也必須提出，公債推銷工作的能否順利完成，重要的關鍵，還在於是否進行了充分的工作。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必須重視這一工作的領導，不應認為數目不大而大意疏忽；不可因為羣衆踴躍認購就以爲可以不做工作而能照例完成。因此，在公債發行以前和發行當中，必須做好充分的宣傳動員，使人民徹底了解發行公債的意義及其對公對私的利益，從而樂於認購。必須注意各地各界間數字分配的合理和適當，對於那些人民收入較大的地區和方面，可以多推銷一些；而對於那些收入較少的地區和方面，則可以少推銷一些，甚至免予推銷。認購面不能太小，而且要按照購買者的可能和自願。政務院指示中對於積極分子「不必認購過多，以免影響生活」，「對於無力購買之工人、農民、公教人員及其他各界人民，不得強令購買」的規定，必須得到遵守。必須組織有力的公債推銷委員會，經過這一組織進行民主協商和動員廣大人民。必須在一切準備工作做好之後，才可以開始發動人民認購。認購時間不必過長，以免影響其他工作。

愛護公共財物

寶 衡

我們相信，廣大人民和國家工作人員都已有了「一九五〇年發行公債的經驗」，只要準備工作做得充分，這次公債的推銷工作，一定能夠順利完成。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之下，爲了建

「愛惜常住物，如護眼中珠」，這是各寺廟經常用紅紙條寫着貼在牆壁上警策大家的兩句格言。「常住」有公共團體，保持不壞的意思，這裏是指佛教寺廟而言。「常住物」也就是佛教寺廟裏的公共財物。佛教徒愛惜寺廟裏的公共財物，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這是深深地符合共同綱領上規定的「愛護公共財物」的公德的。

解放以來，全國人民有一個共同的真實的感覺，就是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一切公之于人民，一切服從全體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了「天下爲公」。用佛教術語說，也就是把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當作全體人民的「常住」。而事實上的確有許多人是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來愛護這個全體人民的「常住」的。例如在洪水危急，眼着着金黃色的莊稼就要遭受損害的時候，有像王洪春那樣的防汛英雄把自己的身體堵在堤岸的裂口，挽救了危局。又如紡紗廠裏多出皮軋花是非常耗費原料的，十七歲的女工郝建秀響應工會的號召，創造出一套少出皮軋花多出棉紗的辦法，使皮軋花降低到百分之〇·二五。據說全國紗廠皮軋花率如果降低到郝建秀的標準，一年可以多產四四四六〇件棉紗，因少出皮軋花增加生產的超額利潤，就可以買六七十架織布機。這是一個多麼可觀的數目字，而是從愛護公共財物的這一公德發揮出來的。現在全國各階層出現像王洪春、郝建秀那樣的模範人物很多，他們的文化程度大都不很高，但有一腔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祖國和人民所有的公共財物的赤誠。這赤誠使我們祖國的一切偉大建設得到勝利，使整個社會從漆黑

設我們偉大的祖國，全國人民必將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一九五四年國家建設公債的發行。

一團而進入光明。

佛教徒在新社會中所感受到的，當然不會和其他各界人民有所不同，那末，把愛護常住的觀念擴而充之，來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祖國和人民的公共財物，也是理所當然的了。這在思想上首先還應該知道：個人的一切，包括生活、事業、幸福等等在內，離開了大眾是沒有辦法可以得到的。大眾好了，自己纔會好；大眾受到損害，自己必然會連帶受到損害。受損害是禍事，得利益是福德，避禍得福是智慧，所以一個佛教徒如果要圓滿福慧，除了盡力爲大眾謀福利以外，沒有其他更好的「法門」，而愛護公共財物是爲大眾謀福利的途徑之一。

但是有些佛教徒說：「公共財物固然是應該愛護的，不過，我們有的住在山上，有的住在農村，有的雖然住在城市裏，但也不過是料理寺廟而已，所接觸到的公共財物很少，因此也就無從愛護起。」這種說法其實是十分不正確的。例如住在山上的佛教徒一定多見樹木，樹木就是公共財物。現在中央政府正在大力造林，住山的佛教徒很可以學習護林常識，各就地宜，分別加以保護。住在農村的佛教徒大都從事生產，生產和水利、公糧等等有關，那些都是公共財物，我們都有力量加以愛護。總之，公共財物隨處隨時都有，愛護的方法也隨處隨時而異，只要我們有此認識，愛護的工作是非常之多的。譬如防汛英雄王洪春把自己的身體堵在堤岸裂口，挽救水災，這是愛護公共財物的偉大行動。假使我們正在那裏，看見了王洪春那樣做，馬上號召大家幫助王洪春竭力搶救，也就是愛護公共財物。又如郝建秀創造了一套少出

皮靴花的辦法，為國家節省了大量棉花，在紗廠做工的佛教徒如果學習郝建秀的辦法，對於愛護公共財物也可以有所供獻。這樣說來，只要我們佛教徒肯開動腦筋，圓滿福德智慧的道路是非常廣闊的。

又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是死不甘心的，它們時時刻刻想破壞我們勝利的果實。如本月三號人民日報發表，天津市破獲美蔣反革命特務屈鴻祺陰謀破壞的案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據報上說，屈鴻祺在美國特務頭子的直接指使之下，于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從香港潛抵天津，後來又偷偷地運進爆破器材和毒藥來，希圖破壞天津市人民政府建築工程局天津建築公司某重要工地、中國石油公司華北區公司某重要儲油庫和天津市公私合營的新中原公司等。幸而天津市公安局防範嚴密，事先破獲，現已將屈鴻祺和其他從犯依法分別判處死刑和徒刑。但是屈鴻祺決不是美蔣派遣的最後一個匪徒，以後說不定還有其他特務潛入內地，暗中活動。特務是公共財物的死敵；提高警惕，協助政府破獲特務的反革命活動，也是愛護公共財物的另一方面的表現。至于住在城市或名勝地區料理寺廟的佛教徒，對於愛護公共財物的工作那就更多了，不妨抄錄上月十六號人民日報發表的兩種文件如下，作為參考。

雕刻工作者劉開渠等十人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揭發奸商岳彬盜賣龍門石佛的嚴重罪行。

編輯同志：我們為了研究古代美術遺產，組織了古代雕刻考查團，到大同雲崗、太原天龍山、洛陽龍門等處參觀了古代雕刻。一向被人認為是唐代石刻典型的龍山石窟，已被帝國主義盜竊破壞一空，真是令人痛恨。世界聞名的洛陽龍門的石窟中，數以萬計的佛頭佛像也大部被敲下盜走。據說洛陽龍門石佛在反動統治時代遭到了盜賣和破壞，就中以北京琉璃廠炭兒胡同古董商人岳彬盜竊最多。岳彬勾結帝國主義有計劃地、大規模地盜竊，他一次就盜走大型佛像十八尊，小佛無數，龍門造像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王后禮佛圖」就在那一次被他盜走，賣給美帝國主義者。我們祖國歷代最

可珍貴的美術遺產，竟被他破壞得慘不忍睹，造成無法補償的損失。此種盜賣國家文物喪盡天良的行爲，無異人民公敵。爲此，我們特提出檢舉，對岳彬這樣的好商，必須嚴加懲處。

人民日報短評——「制裁盜賣文物的奸商」
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從新疆的高昌、庫車，甘肅的敦煌，天水的麥積山，解放後發現的永靖炳靈寺，大同的雲崗，太原的天龍山，洛陽的龍門，峰峰礦區的南北響堂山，濟南的千佛山，到義縣的萬佛堂，矗立着一連串壯麗的石窟寺。這些石窟寺都有豐富的精美雕像或塑像或壁畫，是我國藝術史上的光輝傑作，是我國重要的文化遺產。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跟其它古代文物一樣，這些石窟寺大半都成為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的掠奪對象。華爾納剝取了敦煌千佛洞的唐代壁畫和唐代供養人像。天龍山的北齊和唐代造像，幾乎全部為奸商倪玉書所破壞而賣給日本山中商會，其中大半轉賣給美帝國主義分子了。最著名的雲崗石窟、龍門石窟，也在帝國主義分子、當時的反動政府和古玩奸商的相互勾結下，被徹底破壞了。

今天本報三版所揭發的古玩商岳彬盜賣龍門賓陽洞等的雕像和浮雕事件，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美帝國主義分子在龍門照了相，指名要傑出的北魏雕刻「王后禮佛圖」及其它著名雕刻。岳彬就和他訂立契約，保證在五年內把那麼珍貴的文化遺產盜盡下來。岳彬勾結當地反動政府，肆無忌憚地把一千四百年前的藝術傑作打成大小碎片，經過粘對運出。如今賓陽洞著名的浮雕「王后禮佛圖」的一面，就擺在紐約市博物館裏。這樣盜賣文物的嚴重罪行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爲了加強文物保護工作，必須廣泛宣傳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所頒布的一系列保護文物的法令，激發廣大人民愛護文物的熱情。我國是一個文化悠久的國家，除了石窟寺以外，全國分佈着許多古建築、古墓葬、古文化遺址，流散各處的有關革命、歷史、藝術的文物圖書也很不少，必須加以保

護。只要大家愛護文物，保護文物，帝國主義分子和古玩商就無隙可乘了。

從上面兩種文件，可以知道社會各界正在熱烈響應中央政府號召，進一步做好保護古代文物的工作。而古代文物之中，佛教文物所占的比重很大，當然在保護工作方面也就與我們佛教徒有關了。但是佛教徒中有人說，政府及社會各界既然重視佛教文物，並且正在竭力設法分別加以保護，我們佛教徒的責任就減輕了，同時有些文物也不是佛教界的力量所能保護得了的，因此保護古代文物的工作與佛教界的關係不大。這種對待保護古代文物的態度也是十分不正確的，可能在思想上有許多認識不清的地方，現在略略加以解釋。

第一：古代文物（包括佛教文物在內）都是我國歷代勞動人民辛勤創造的結晶品，在這許多結晶品上記載着中華民族發展的史蹟。我們如果要知道我們的祖先如何生活，如何發掘自然的秘密和如何創造歷史等等，除了古代文物就無從找到其他的真憑實據，勢必數典忘祖，造成對於歷史的模糊，影響當前的發展。毛主席說：

「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新民主主義論）

從毛主席的指示上，我們更加可以知道保護古代文物，決不是單純的嗜好古董，或者片面的考古研究，而是要從被保存的文物上吸收其精華，作為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所以保護文物與全國人民目前和將來的利益密切結合着的，每一個人人民都有其一定的責任。

第二：在反動時代帝國主義者勾結着官僚、軍閥、奸商、地痞、破壞盜竊我國的文物，我們除了痛心疾首以外，毫無辦法可想。如果說，在那個時候因為無法可想而保護古代文物的責任很重，究竟有什麼用處呢？現在中央人民政府三令五申保護古代文物，各地政府正在切實遵行，而我們倒反哈哈大笑說：「好了，

古代文物得到保護了，我心裏面的一塊石頭落下去了，我也可以去睡我的覺了。」一鬆鬆倒是夠鬆鬆的，但對於保護文物究竟又有什麼用處呢？一個是擔心，一個是放心，同樣沒有實際的作用，都不是真正負責的態度。

第三，據甘肅省文化教育委員會的馮國瑞先生說，政府爲了切實有效地保護麥積山的佛教文物，在麥積山瑞應寺成立了文物保管所，又在岩洞周圍修建的棧道。不久，對一、靖炳靈寺的佛教文物也要那樣做。這筆經費很大，當然不是我們佛教界所能爲力的。但所謂保護古代文物並非單指石窟寺而言，人民日報短評裏面已經說得非常清楚，現代佛學第三十六期雲音居士所作「在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中佛教寺院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責任」一文中也說：

「解放三年以來，政府正確的執行了文化建設的政策，培養了許多考古工作者，在各城市成立了文化館宣傳保護文物古蹟，在各地都調查了發掘了許多古文物，其中有許多是有關佛教的古建築與雕刻。這些建築與雕刻，如寺院、塔、幢、摩崖、石窟等類是在地而以上，人人可以看見，可以調查研究，可以考定鑒賞，這些文物是容易被發現，被重視而得到保護的。此外還有寺院以內所收藏的文物，例如一卷經、一軸畫、一個鐘、一口磬、乃至一磚一石之微，若不是僧尼自己能鑒別、能愛情、能保護、是不易被外人發現而加以重視的。」

這都是說明佛教文物的範圍很廣，數量很多，如果不是我們佛教徒自己積極起來參加保護的工作，也就可能造成無法補償的重大損失。例如山西太行山上某一古寺裏，據說有很多唐寫本、宋版和梵文的佛經，現在都散失了。又如北京西郊某寺裏的寶貴藏經，從前散滿幾屋，無人保管，曾被懂得版本的遊人在那裏面揀了幾部宋版法華經去。此外還有一些僧尼把藏經當爛紙賣，而且竟有自己撕碎了賣出去的。這許多都是罪惡，在過去固然不應該有，在今天更不應該有。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號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段消息說，最近在

佛家辯證法

呂澂

恩格斯在所作「自然辯證法」的札記裏，曾經說人類理性發展到較高階段才能有辯證的思維，並舉佛教徒爲例（見曹葆華等譯「辯證法與自然科學」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六五——六六頁）。他是見着佛家那一種理論而爲此言，我們還不很明瞭，但佛家的思想方法一開頭就帶着辯證的色彩，並且後來還逐漸發達，而始終就很遠的走在西洋人思想的前面，這是稍微留意佛家學說的人，都會有那樣感覺的。最先，原始的佛學裏含有辯證意味，爲後來思想向這一方面開展的根據的就有三點：其一是分別說，這反對一向的即片面的看法，而與現象的隨時變化相應。其次是中道說，這反對偏執一端的看法，而與現象的相對性相應。最後是緣起說，這反對孤立的看法，而與現象的互相依待、增上相應。這些都具備辯證的意味，到了發達了以後，就成功爲佛家的完全辯證法。

在小乘部派佛學裏分別說等方法雖然被運用着，但是偏向辯論的或形式的方面，並未能盡其實效。像南方上座部的教典「論事」裏，藉八門的分別論法，從各方面發現論敵的矛盾來使它墮負，這完全流於形式，便是一例。到了大乘佛學流行，佛家的辯證法纔有正當的開展。典型的著作是古本「寶積經」，後來編入大部，稱爲「普明菩薩會」。它裏面詳說菩薩藏十六門教授，最重要的是菩薩行的自性，由正行中安立所學，即用理論來聯系行事，求其一致。而所舉的正觀法門，內容貫穿着十三種中道行，要將真實的見地應用到一切行爲上，隨處都採取辯證的方法。它不單着眼於對象自身的矛盾，並還連接到思想和實事的矛盾；不單顯示出這些矛盾而已，還要進一步克服它。這樣觀察和行動打成一片，自然不僅僅是思想上辯證的發展了。我們從後來發揮此意的「辨中道論」上看，就很容易明白的。

「中邊」引據「寶積經」的中道行解說無上乘（即大乘）的正行，謂之離二邊。它對於原文只說一方面的，都舉出相反之點，並統一了這兩面而成中道。譬如第一種正行，「寶積經」原文說，不觀諸法有我、人、壽、命（這就是秦譯「金剛經」裏面的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中邊」發明了它中間的辯證意義，以爲這是針對執着色等五蘊與「我」爲一或與「我」爲異而言的。若對內色等執着爲「我」，而視作見者、聞者、覺者、知者，這些是色等與「我」爲一；又若看色等是另外一種「常我」所受用，這是色等與「我」爲異；一異兩邊都是從色等法上可以引申出的見解，也係色等法本身所含矛盾之點。如何來統一它，就要推究到這樣矛盾的來源「我執」。從根本上去掉執着，自然會統一了矛盾。這還是主客觀聯系着而說，要進一層研究，便明白主觀的執着並非無端而起。即認它是病目空華，也必有病、有空爲其依據。所以發現矛盾的原因從而除掉它以後，得着了對象的真實，還要加以改造，使其不再引起矛盾。這樣辯證法的運用便不簡單了。又如第五、第六種正行，對治關於法相的增減執着，這先從「常」「無常」說起。執着的是外道，他們被「常住顛倒」所惑，而加以種種執着，執無常的是小乘，他們追求斷滅的涅槃，而生起各樣執着。這兩類執着對於同一的現象上說，是互相矛盾的，也就是那現象會具備着引起這樣矛盾的複雜性和相對性。現在正確地觀察，諸法有連續相似的相狀，並非絕對的無常；又有緣起生滅的相狀，也不是絕對常住，這樣離掉兩邊的固執，才會認識到諸法的實相。進一層，常與無常的執着純由「我執」而來，那末，在諸法上有我相是一邊，無我相又是一邊，這兩者也是互相矛盾的。現在應該觀察諸法無所謂「實我」，去其增益執；但有假施設的我相，去其損減執。這樣離卻兩邊，才得着諸法的實在。再進一層，我與無我

的執着是關係着「心」的實在與否的，這裏就又有「一重矛盾的看法。但正確的觀察，應該是看心法為緣起的，不是實在，去其增益執；心雖無實法，而有分別相狀在着，這又去其損滅執。如此離卻兩邊，才得諸法的實相。還可進一層推究，這些法相的辨別，原來為了能所對治之用，所以在諸法上還可以看得出善、不善、染、淨、有過、無過、世、出世、有為、無為、有漏、無漏等等對待矛盾，而這些對待矛盾之相，都需要得其辯證的認識，才能成就「正觀」，使實踐履行於「中道」。由此，隨在一種的現象裏，都會有複雜的性質，以致主客觀的相涉層次重重，不是簡單的觀察便能窮其實在的。佛家辯證法的運用，在這些地方最能發揮所長。上面從「中邊論」的解釋已經明瞭「寶積經」所說辯證法的一斑，此外有好些大乘經也有同樣的材料，像「維摩詰經」的「入不二法門品」及「金剛經中」即非、是名」的說法，都是最顯著的一例。

到了龍樹，佛家辯證法的運用邁進了一大步。他的學說是通過當時流行的各種大乘經，而上承原始的佛說的。在他所著「大智度論」裏，首先肯定了佛之所以為佛，即在能如實分別諸法的自相，共相。這屬於分別說，卻非簡單的分析，應該是由辯證的正觀而窮究諸法的實相的。此意在「中論」一書裏更有了發揮。論首兩個歸敬頌，後來也被稱作「入般若初品法門」（用無著「順中論」意的），就說明佛教最殊勝之點在以「八不」解釋緣起。「八不」為一類分別說的法門，根本意義與「寶積經」相通。由於執著諸法有實在的自體，便會跟着來了生、滅、斷、常、一、異、來、去等相的法執；假使明白法體之不實在，自然八相俱非。但是諸法緣起、生滅等相並非純無依據的，所以在這些中間應該離開兩邊的執着來觀察它、理解它，以得着合理的實踐。佛的學說，便是能夠最善巧、最完全表白這一層意思的，因此稱為最勝之說。

龍樹用辯證法來闡明諸法的實相，歸宿到無自性的「空」，而「因待他，見有變異」（用「十二門論」語意），並不破壞「緣起」，這是根據原始佛說「諸行無常」的根本道理。更進而藉「世諦」顯示「第一義諦」。再由「第一義諦」達到「涅槃」——人生理想中的絕對安穩狀態。因此「中論」最後的結論「觀涅槃」一品明白的說，一切法空，不生不滅，不斷不常，這樣便是涅槃狀態，更無需乎斷滅它，如此總結到涅槃與世間（諸法）沒有少許分別。反轉來就世間說，它和涅槃也不會有分別，因為涅槃的實際和世間的實際（即涅槃性）是平等的；這也可說，世間的實際即等於涅槃。由此可見，龍樹的辯證法實相觀完全和實踐相聯繫，是着眼於除滅一切戲論執着以得到絕對安穩的境界的。後來無著解釋「中論」，很能領會這層意思。「順中論」裏便說，不生不滅等八門應該作非生非不生，非滅非不滅等解釋。因為說不生，並非指出一種法決定是不生的，不過破除了生的執着而已，生的執着既然破除了，不生的執着當然也不許有的。這和用藥治病一般，應該是藥病同離；如果病去藥存，反而成為另一種的病了。所以觀察不生是生與不生兩方面俱遣的。絕不像常途所解，世俗有生而勝義不生，那樣地截然成為兩事。實際離了第一義諦（即勝義），也無所謂世諦，這就是龍樹說涅槃與世間實際不異的根據。

龍樹所說的八不法門又還解明了諸法變化不停的原因，即一切現象的本身就具有不得不時刻遷流變異的原因，並不待另外的「作者」。這層意思，見於青目註解「中論」所引用的一段「無畏論」論文。那上面用世間經驗的事實來作解說，譬如穀物，現在所有的大都是從無始即很遙遠的時間展轉相續而來，絕不是隨時有特異的新種，從無生有，所以可看作「不生」。但是，從前的穀類既然展轉傳來，直到于今，可見原來種屬並沒有消失，這樣又可看作它作「不滅」。在這中間，卻有各樣的變化，譬如由種子而發芽，而生莖，披葉，開花，結實等，各各不同，所以可看作「不常」。不過，芽雖非種，而依種起，如是由芽而莖，由莖而葉，而花，而實，都是相聯系着的，所以又能看作「不斷」。再進，種與芽形象不同，即是「不一」，而同屬穀類，不與其他相混，故又是「不異」。芽從種而生，並不像鳥的棲樹由外而來，所以可看作「不來」。但這是種的全部變異而發芽，也不同於蛇的出穴從

此他往，所以又可看作「不去」。這些都是平常經驗裏所得對象變化的情況，而它們自身中即具有不得不時刻變化之勢，新的念念發生，舊的就得念念消滅，剎那不停，其間必有矛盾的力量為之推動，不可待言。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闡明辯證法中「否定之否定」規律，也同樣地用種和芽來做譬喻，可見古今人對於現象實相的理解，不會相差太遠的。（見「反杜林論」第一篇、第十三章）

慈氏、無著跟了龍樹更加擴大辯證法的運用。像「大乘莊嚴經論」裏講到諸法的實相，就用五種不二門來作形容。但它立義的根據在「遍計」「依他」「圓成」三性，而「圓成」性並不局限於自性清淨一義，另還有離垢清淨之意，因此合攬三性觀察實相，就含有前後變化的過程在內。例如，第一種不二法門舉「有」「無」說，從遍計、依他性看是不實的、非有的，但從圓成看是實在的、非無的，這些經過了變革，依計轉作圓成，才構成辯證性的非有非無。其餘非一非異等，大體意義也類於此。這樣綜合了諸法全體並從先後變化去觀察，在那裏面的矛盾性質以及如何去克服而得其統一，可都明白地顯露了（「辯中邊論」簡化「莊嚴論」意，單以有無不二法門顯示諸法實相，尤見精采；其義易曉，現不另加解說）。這較之龍樹所闡明的更加具體，並且改變了龍樹單純的遮詮法門而兼有表詮，使實相的認識益見深刻，可算是佛家辯證法高度發展的一個階段。

此外，在佛家的「因明」裏，辯證法也多方面的被應用了。因明原以推究判斷思維的理由（因）而得名，開始側重辯論和論證方面，用來證明自宗的主張，並摧伏他家的異執。後來這一門學問發展為認識論，以正確的量為認識的標準。量的種類有現量、比量。現量是感覺，比量則是推理思維。在因明理論上，認識的全程是由現量的感覺，經過比量的推度，再達於更高的現量。這不是普通的感覺，而是離開名言（概念）分別所成的親證，也就是藉比量上抽象名言的理解而後體驗到具體事實，密切符合而為「瑜伽現量」。如延長這一經驗，便能到達名言與事實統一性的認識（「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真實義品」裏說為名言自性與離言自性的平等相），這又算是佛家辯證法的另一高度發展的階段。在這中間，名言本身的構成也離不開辯證方法。這從陳那以來用「遮詮說」闡明其意義。大略說，名言都以遮遣為本質，像詮釋青色的名言「青」，即以遮遣其餘一切「非青」的法來作表示，並不能正面說明青色的實質。這種說法給予當時婆羅門學系視「聲量」作知識的一種源泉的以沈重的打擊，又使佛家更有理由隨順名言的性質來用否定方法進行對一切現象辯證的認識，其影響可謂是極大的。後來從法稱以次的因明學者，對於此義有很多發揮，不為無因。

以上，我們就佛家思維方法上的辯證性質，略加歷史的敘述，已可見出它發展的情形，並明瞭其特點。其間最可注意之處，即是佛家的辯證法不僅僅是客觀現象中辯證性的反映，而特別側重於主客觀交涉上面辯證的意義。這和佛家沒有純粹宇宙觀而祇是聯系人生問題去尋求現前存在現象實相的一點極有關係，我們當另題解釋，這裏便不多說了。

一九五三、一二、二八。改寫稿。

保護古代文物的意義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社會文化管理局
鄭振鐸局長談話稿錄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為了「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對於古代人民——我們的祖先所創造出來的燦爛文化，可寶貴的民族遺產，是必須加以保存、保護和清理的；特別在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程的進行中，更要加意保存、保護古代文化的工作，堅決防止破壞和糟塌。

中國共產黨一貫的保護古代民族文化遺產，無論在游擊戰爭、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最艱苦階段，都在切實執行着正確的及時保護文物的政策。在山西趙城縣的一個古廟裡，保存着一部元代（十二世紀）所刻的大藏經，是卷子本，原有四、五千卷，歷經盜竊只存了三千六百多卷。日寇侵略山西時，我們的黨便命令保護這部古代的大藏經。在轉移時便由戰士們肩挑了走，因此犧牲了幾個人民的英雄。後來又把它保存在一個山洞裏。北京解放後，才全部無缺的移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來。

我們堅決反對亂拆、亂改、亂挖的現象，堅決與一切「違法亂紀」的現象作鬥爭。古物一旦被破壞了，便不能再有，不可再造。

印度梵文對中國聲韻學的影響

李子日

中國聲韻學曾經受過幾次的外來影響：一、印度梵文的影響，二、羅馬字母的影響，三、滿文字頭的影響，四、近代語音學的影響。撇開二、三、四不談，專論印度梵文的影響。宋鄭樵通志六書略論華梵下說：「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這幾句話講得很好，很能說出華文、梵文兩者性質的不同來。漢代佛法傳入中國，中國人受了「從聞入」的梵文的影響，就創製了反切。隋、唐以來，一班翻譯佛經的僧侶們又創造了字母和等韻；現在把反切、字母、等韻三者分述如下：

一 反切

漢字注音的方法，諧聲之後有直音，直音之後有反切，反切之後有注音字母，這是聲韻學上的常識，凡學過一點聲韻學的人沒有不知道的。反切，就是拿兩個漢字注一個漢字的音，上一個字和所注的字，聲母相同（雙聲），下一個字和所注的字，韻母相同（疊韻），上一個字要聲母不要韻母，下一個字要韻母不要聲母，把上一個字的聲母和下一個字的韻母拚在一起，就是所注的字的音；舉例來說吧，東、德紅切，德字念ㄉㄛ，紅字念ㄏㄨㄥ，德字要ㄉ不要ㄛ，紅字要ㄏ不要ㄩ，把德字的聲母ㄉ和紅字的韻母ㄨㄥ，拚在一起，就是東字的念法。在音理上說來，這和注音字母的注音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不過反切的注音工具是整個漢字，注音字母的注音工具是符號罷了。

反切，是怎樣產生的呢？關於這個問題，在中國聲韻學史上，有兩派人的主張：一派人說是受梵文的影響，宋朝的鄭漁仲、沈存中、陳直齋，清朝的紀文達、姚惜抱等，都屬這一派；一派人說是中國自己創造出來的，清朝的顧亭林、陳東塾等，都屬這一派。顧亭林認為反切的方法，漢朝以前就有，列舉了蒺藜為茨、

不律為筆等幾十條證據來證明他的說法，陳東塾根據這種說法，更變本加厲，認為反切在周、秦時代已經有了。這兩派人的說法，那一個正確呢？我們認為前一個人的說法正確，要證明這一點，應該先知道反切產生的時代。顏氏家訓音辭篇裏說：

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後世研究聲韻學史的人，都根據這種說法認為孫叔然是反切的創造者，獨章炳麟不贊成這種說法，認為反切並不創始於孫叔然，在漢朝應劭時已經有了；他在音理論裏說：

經典釋文序例謂漢人不作音，而王肅周易音，則序例無疑辭，所錄肅音，用反語者十餘條。尋魏志肅傳云：「肅不好鄭氏，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假令反語始於叔然，子雍豈肯承用其術乎？又尋漢地理志廣漢郡梓潼下，應劭注：「潼水所出，南入熱江；熱、音徒浹反。」遼東郡沓氏下，應劭注：「沓水也，音長答反。」是應劭時已有反語，則起於漢末也。

這種說法出來之後，研究聲韻的人都相信章氏的說法，不再相信孫叔然是反切創始人的說法了。但是在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仍未說到最好地步；章氏之後，研究這個問題的人，我覺得以趙蔭棠的說法最為精當。他根據謝啓昆的小學考和日本人大矢透的說法，證明許慎和服虔已經用過反切，並認為反切是受了梵文的影響才產生出來的。他在等韻源流裏說：

大矢透氏證明此反切非後人所能依託，確鑿可信。由此可知許氏之反切散見於他書者，俱為可信。許氏是服虔的前輩，則服氏通俗文之有反切，更無足怪。執是以論，將謂反切起於周、秦，若顧、陳之說麼？決不！周、秦至漢所有之

合音，乃天然的。漢代以後之反切，而是人爲的。這個人爲的反切，非有外力不能產生。我們在上章講過漢哀帝以後正是梵文浸入的時候，則學梵文者當然先知其拚音，因此而悟出來反切。反切初起的時候，直音正在盛行，所以儒家或出之，而不用之。且人自爲政，毫無系統之可言。服虔通俗文，用之較多；孫炎爾雅音義，用之有序；所以後世獨知二家。而二家之中尤以孫氏爲著，所以世人推爲反切的鼻祖。趙氏這一段話是完全正確的，他不但講明白了反切產生的時代，也講明白了反切所以產生的原因。應用拚音的道理來注字音，不受拚音文字的影響，是不可能產生出來的。清朝初年李光地、王蘭生等作音韻圖微，發明合聲反切的方法，是受了滿文十二字頭的影響；民國初年，錢玄同、黎錦熙等創製注音字母，是受了西洋拚音文字的影響。假使沒有滿文的輸入，李光地等也發明不了這種反切方法，不受西洋拚音文字的影響，錢玄同等也創造不了注音字母。這和假使沒有印度梵文的輸入，漢朝人發明不了反切，是同樣的道理。顧亭林、陳東塾等受儒家「攘夷狄」思想的束縛，戴上有色眼鏡看東西，看不清楚，是理所當然的。

二 字母

在中國聲韻學上，所謂字母，是指紐的代表字而言，意思和現在所謂聲母完全相同。關於字母，呂維祺同文鐸裏有一段記載：

大唐舍利瓶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是爲三十六母。

流傳到

現在的字母，有三個系統，一種是唐人的，歸三十字母

- | | | |
|-------|-------|-------|
| 端丁當顛敵 | 精煎將尖津 | 知張衷貞珍 |
| 透汀湯天添 | 清千槍僉親 | 徹偃仲禮縷 |
| 定亭唐田甜 | 從前牆替秦 | 澄長蟲呈陳 |
| 泥寧囊年拈 | 喻延羊鹽寅 | 來良隆冷鄰 |
| 審昇傷申深 | 見今京鏡居 | 不邊連賓夫 |
| 穿緝昌噴靛 | 僕欽卿塞祛 | 芳偏鋪續敷 |

禪乘當神誌
曰仍稷志任
心修相星宜
邪因祥錫旋
照周章征專
唇音 不芳並明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頭音
牙音 見溪羣來疑等字是也
齒音 精清從是齒頭音
喉音 心邪曉是喉中音清
一種是宋人的三十六字母：
重唇音 幫滂並明
舌頭音 端透定泥
牙音 見溪羣疑
正齒音 照穿床審禪
半舌音 來
羣奉敬囊渠
疑吟迎言斂
曉馨呼歡祇
匣形胡桓賢
影纓烏剌煙
知徹澄日是舌上音
審穿禪照是正齒音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濁

字母的創造，受梵文的影響，乃毫無問題之事，不必詳加考證，觀呂維祺的話，便知端的，創始者是出家人，修補者也是出家人，這即是受梵文影響之鐵證。但是清朝有一般漢學家，如戴東原、錢竹汀等，對於字母，深閉固拒，絕不承認受梵文影響之事，甚至於連字母的名稱都不肯用，這也是受了儒家「攘夷狄」思想的束縛，對文化交互影響的道理，看不清楚。現在爲了使大家更明瞭起見，把這個問題，再講說一番。隋書經籍志裏說：「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高僧傳宋釋慧叡傳裏說：「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並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修理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謝靈運條理楚、漢，就是以印度字母整理漢音，他所叙十四音，就是隋志裏面的婆羅門書十四字。吳稚暉作國音沿革序，認爲這十四音就是廣韻裏所附錄的辨

羣奉敬囊渠
疑吟迎言斂
曉馨呼歡祇
匣形胡桓賢
影纓烏剌煙
知徹澄日是舌上音
審穿禪照是正齒音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濁

十四聲例法，他拿佛經裏所附錄的十四類字母，和這十四聲例法比照而研究之，得到以下的結論：

倘問廣韻十四聲之次序，何以與佛經之次截然不同？此即仿照婆羅門書之十四音，從新用東方面目變換之，定為中國自己之十四聲例法也。其次依照何例為先後？第一步用西學做成這中學之體，時代在漢末；於是再用西學之十四音，按照中學之五音法，成功十四聲例法，其時代在晉、宋間。……所以辨字五音法者，六朝時候大等韻家之七音也；辨十四聲例法者，六朝時候等韻字母之胚胎也。……十四聲例法，一變而為三十六字母之等韻，則因煙、人然等三十類切字要法，實為其過渡之樞紐。……

吳稚暉發表了這篇文章之後，三十六字母是由印度梵文字母變化而來，成了定論；後來劉復又作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證明：『守溫所定三十六字母，非直錄梵文者，乃參酌中華當時之語音而成，凡梵文所有而華文所無者，彼則減之，華文所有而梵文所無者，彼則增之。』這不但說明了三十六字母是由梵文字母變化而來，更進一步說明了三十六字母和梵文字母的實際關係。讀了吳氏和劉氏的文章，我們感覺到清朝的戴東原、錢竹汀諸人，在這一點上，真是頑固萬分，無理取鬧。

三 等韻

什麼叫做等韻呢？關於這一個問題，趙蔭棠在他的等韻源流裏有一段解釋：

何謂等韻？簡言之，就是音表。音表中有格子，每橫格算一等，每等中所填的韻字，就是每音的代表。我們若把這種音表練習熟了，不惟知道韻書的韻字，屬於何紐，而且知道他們的洪、細，這本是許許多多的反切的以簡馭繁的方法，所以吾友魏建功先生說他是練音表。

等韻是怎樣產生的呢？換句話說，就是他的來源如何呢？關於這一個問題，張世祿在他的音韻學裏有一段說明：

吾國自來講音韻的方法，由雙聲、疊韻進而為字母和韻母，由字母和韻母構成了等韻表；無非是要說明反切之理。勞乃

寬等韻一得外篇云：『反切始於魏世，在雙聲、疊韻之前。雙聲、疊韻始於六朝，在等韻之前。由反切而為雙聲、疊韻，由雙聲、疊韻而為等韻；漸推漸密，皆以明反切之理。故等韻之學，為反切設也。』案雙聲、疊韻之名，雖起於六朝，而雙聲、疊韻及反切之理，自古已具。到了漢末以後，印度梵文拼音學輸入中國，於是發生反切，發生韻書和字母。應用等、呼和字母來說明反切，就產生了等韻之學。陳

傳謂：『自魏、晉、南北朝、隋、唐，但有反切，無所謂等韻。唐時僧徒依倣梵書，取中國三十六字，謂之字母。宋人用之以分中國反切，韻書為四等，然後有等韻之名。溯等韻之源，以為出於梵書可也。至謂反切為等韻，則不可也。反切在前，等韻在後也。』其實等韻學，不過是進一步應用字母來講明韻書上的反切罷了，是『由切語之學所變而成』的。所以我們要推述等韻學的來源，自然要講到反切和字母。

這一段話，講得最好，他不但認為反切、字母、等韻是受了印度梵文的影響才發生的，他並且認為韻書也是受了『印度梵文拼音學理』的影響才發生的，於此可見印度梵文對中國聲韻學影響之大。我們現在研究隋、唐語音，需要根據種種材料，宋、元等韻學派的等韻表，就是種種材料之中最重要者之一，這實在不能不說是隋、唐時代的僧侶們對中國學術上的偉大貢獻。

四 總結

從以上的論述裏，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國聲韻學的發生、發展與成立，完全是因為受了印度梵文的影響；所以然者，這中間也有個道理，就是：中國人所使用的方塊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從方塊漢字的本身分析不出『音素』來，這在研究漢語的語音和字音方面是一個大障礙，所以必須等受到了梵文拼音道理的影響，才能發生、發展、建立起來，這是不得不如此的自然趨勢，是中國聲韻學史上的事實，不容任何人抹煞或否認的。末了，還有一點意思，應該交代一下，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是僅就印度梵文而言，假使我們要擴大範圍，就整個佛學而論，那對於中國學術的影響就更大了，最明顯的例證，在中國哲